

亲历

在西北大漠中的罗布泊迷路，这是当时所有险情中的恐怖之最，攸关生死。

世界上最广袤的无人区，寂寞加无限的未知，让罗布泊深不可测。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起，罗布泊除了解放军驻扎，偶尔也有科考队的身影。直到1990年以后，才陆续有胆大的驴友挑战罗布泊，但一些探险者不幸倒在那个酷热而干燥的地方。

神秘的楼兰古国，幽深的小河享堂遗址，千奇百怪的雅丹群，沉睡的瓦石峡古城，干枯而坚毅的胡杨林，看不到头的盐碱地，造就了罗布泊千百年的幽深与渺茫不可知。

也正因为这个原因，罗布泊后来成为最诱人的探险地，探险者用现代化的通讯和交通工具，把走进罗布泊湖心当作一生的荣耀，但也由此上演了不少人间悲剧。其中，著名探险家余纯顺1996年6月13日在罗布泊遇难，让人深为痛惜。往前推，1980年6月17日，著名科学家彭加木在罗布泊湖心东南方向的库木都克以西神秘失踪，震惊了世界。

罗布泊探险热那段时间，我的岗位就在那里。我当时作为一名解放军战士，居然在执行一桩轻车熟路的任务时，在夜色中的罗布泊迷路了……

1 没走两步就摔倒了

往事重提。话头在40多年前的戈壁滩罗布泊上。

这话要从1978年11月说起，当时冬季征兵开始了，我们踊跃报名参加，只知道接兵部队是新疆过来的，其他的并不清楚。我们这批重庆新兵主要来自九龙坡区和渝北区（当时叫江北县），刚好100人。街道敲锣打鼓、挨家挨户送入伍通知书，周围的邻居羡慕得很。

大概是在那年的12月23日，我们到区政府招待所统一换装，我们兴奋得控制不住了。宣明是我的小学同学，我们同时入伍。

12月25日下午，我们在菜园坝火车站乘坐军列告别家乡：1979年1月2日清晨，到达新疆吐鲁番大河沿火车站。然后乘坐解放牌军用大卡车，穿越铁门关，长途奔波390多公里，走了差不多13个小时，终于在当天夜晚10点多钟到达距离库尔勒20余公里的部队营区。

那天晚上，我们第一次感觉到新疆的寒冷，印象最深的是营区地下都是结了冰的，脚下溜滑。

刚从卡车上跳下来，突然就听到“噗噗”的几声，原来是好几位战友不适应冰天雪地，加上坐了一天车本来就头昏脑胀，没走两步就摔倒了。爬起来，摇摇晃晃的又摔一跤，嘴里面还忍不住嘀咕：“哎呀，哪个恁个滑哟！”

这时候，就听到二排长李维高声招呼大家：“下了车不要忙走，先站稳，把身体站平衡了，一步一步再走。来，就像我这样走，看清楚没有？”

我因为一路晕车，刚跳下车还没站稳，就“哇哇”地朝地上呕吐了。想起自己才18岁，一下子远离父母和兄弟姐妹，远离重庆熟悉的大街小巷，那一瞬间竟有些伤感，想哭。

我的班长姓董，北方人，个头很高大，他赶紧把我扶住，鼓励我坚持住，顿时就让我感觉到温暖。

2 大雪覆盖戈壁滩

第二天新兵连军事训练开始了，练得很苦，很认真。训练场上杀声震天，简直要把脚下10厘米厚的积雪给踏碎了，就是那种生猛的感觉。

进入到2月下旬，有一天我看见二排长李维跑到炊事班，然后端着一碗鸡蛋面走进一班。后来才知道，是来自九龙坡区石坪桥的战友周胜利生病了，出不了操，李排长特别叮嘱他的班长要多关心新兵，还亲自到炊事班帮忙端面条，当时叫病号饭。

那是个特殊年代，自卫反击战已打响了十来天。因为是新兵，也不了解更多的情况，私底下几个战友悄悄议论：我们部队会不会上去，哪个时候上去，上去了怕不怕……反正就是跟打仗有关的话题。

战友杨德华是从原江北县的石船区麻柳乡参军的，人长得虎头虎脑，提起打仗，他瓮声瓮气地说道：“到时候要上前线，老子第一个报名，不得虚！”

打仗的龙门阵刚摆完不久，有一天刚吃过晚饭，突然就听董班长大喊：“动作快点，紧急集合了！”

也就5分钟的样子，全连全副武装集合完毕，孙连长一声令下，我们朝着戈壁滩的深处跑步前进。

当时并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，尤其是我们这些新兵，大家只是感觉到这次紧急集合跟平时的训练有点不一样，气氛很紧张。

在大雪覆盖的茫茫戈壁滩，我们跑出3公里之后，就感觉越跑越吃力。

周胜利实在跑不动了，一屁股坐在雪地上，嘴里大口大口地喘气，被二排长李维踹了两脚后，最终也没有掉队。

那天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任务。孙连长说，军人，必须要把战斗的弦绷得紧紧的，每分每秒都要拉得出去！

3 狐狸跟着卡车跑

三个月新兵连训练结束后，战友们各自下到连队。

我们在部队是一支站团建制的特种技术部队，战友们习惯简称为六站，部队承担着国防科研和军事训练的特别任务，用许宗明老站长（团长）的话来说，就是“导弹再入测量、弹着点观测、导弹残骸搜索回收”。站团指挥部设在库尔勒近郊，各营、各中队和各分队相对独立地分布在方圆几百公里的戈壁滩上，最远的直抵罗布泊腹地，全站军事任务精密又繁复。

战友李光华从当时的江北县石船区参军，他下的连队是站团第三营雷达测量营，对外称“向阳公社”，距离库尔勒约180公里。

专业训练忙，文娱生活单调，三营战士每次外出执行任务，一路上看见什么都新鲜，都要叽叽喳喳兴奋一阵，说来都好笑。

战友周俊良是从九龙坡区李家沱（现归巴南区）参军的，他下连队是在“向阳公社”的气象站。1980年5月的一天，他们气象站探空组的战士出营区执行任务，路上忽然看见一只狐狸，一直跟着卡车跑，狐狸好看的毛色再加上样儿乖巧，看得周俊良他们目不转睛，满脸的心花怒放。

实际上真的要条件艰苦，指导员杨秉厚的体会更深。

杨秉厚初到三营，是在1972年9月，他从长沙工学院计算机系毕业不久。他回忆说，那个时候的营区只有简单的铁丝网，沙枣树拉起的围墙，正在修砌的土坯营房，用电只有在执行任务和晚上的几小时，熄灯号以后整个营区完全是黑黢黢的。最头疼的是水，是从远处建设兵团的大干渠引过来的，上游那边人蓄共饮再加上洗涤倾倒，到三营这里已经又苦又涩，还有一股臭味。

1976年元旦过后，杨秉厚的妻子千里迢迢从北京来到部队探亲，她腰酸背痛地刚从水泥罐车驾驶室跳下来，一看到营区的简陋环境，忍不住哭了。

还好，苦是苦，累是累，但大家都很顽强，在那个条件艰苦的年代，老兵的顽强，就是我们的标杆。

作者常克（左）和二排长李维1979年在六站指挥部合影

罗布泊迷路 重庆老兵 生死历险记



□常克



杨秉厚（左）和李光华2018年8月重返“向阳公社”老营房合影

4 惊心动魄罗布泊

现在，来说本文开头提到的那次罗布泊迷路。

我们六站的任务，就是在罗布泊围绕导弹落点，进行一系列的观测、搜索与回收。

战友鄂树元从当时的江北县洛碛参军，他第一次走进罗布泊时，感觉自己站的地方好像不是在地上。

对我而言，那一年的彭加木失踪事件在记忆中最为深刻，因为当时我和战友们的扎营地距离彭加木失踪点也就只有20多公里，当年一部分战友还参加了多部队联合实施的搜索营救行动。

至于1979年8月的那个夏夜，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一次罗布泊迷路，至今想起来仍然惊心动魄。

当年，我是六站政治处电影队放映员，一般人可能会认为部队放映员很轻松，其实不然。在罗布泊，我们经常都要面对茫茫戈壁滩和毫无规律的天气变化，每一次奔波执行放映任务，都是一次严峻挑战。

六站那时候在罗布泊的任务区域，我们叫九三五场区，以指挥部37号为中心，方圆数百公里分布着我们部队的10余个任务点号，它们距离37号则几十公里，远则上百公里，最远的超过200公里。有个点号叫34号，距离37号有190公里，那是什么概念呢？

我在部队时的六站副政委韩洪恩后来回忆说，190公里要是在公路上跑，车两个小时就到了，但在场区里，完全是戈壁大漠，看起来很坦荡，一望无垠，实际上却坑坑洼洼，到处是沟坎，到处是骆驼刺或胖姑娘草的枯根形成的碱包或沙土包，小车跑起来不断地颠簸，到34号至少需要四个小时。

电影队经常都要下点号，尽管如此，对于各点号的战士来说却是每半个月才能够看一次电影，可以想象他们盼电影的急迫心情。

那晚是从37号赶往另外一个任务点号，那个点号有六七位战士，距离有120余公里。我

5 鬼门关走一遭

去年几位老战友小聚，我和当年的二排长李维坐在一起摆龙门阵，偶然提起我在罗布泊的那次有惊无险，居然引出相似的几段故事，真让人有“英雄所见略同”的感慨。

这就要说到和二排长李维的缘分。真的是神奇，重庆战友参军那年，他就是接兵部队中的一位排长。我后来才知道，李排在部队上是电影队的组长，排级干部；我们当兵后，他在1979年6月提为电影队副队长，也就是副连长。新兵连训练结束后，我分配到电影队，走遍了部队的所有营区。

李维本来是四川绵阳人，1992年以中校副团军衔转业到重庆，后来在市级某机关工作直到退休，我们仍然习惯称他李排长。

那天听我说起罗布泊迷路，李排长也告诉了我几桩他当年在罗布泊的惊险，其中单是迷路就有三次。有两次，他和战友被困在戈壁滩上一天多，又冷又饿，就在几乎体力不支的时候，赶来搜索营救的部队战友终

6 走出大漠孤独

在罗布泊，我们走过日复一日的孤独，而那是一种深入骨髓的寒凉与寂寞。

这又让我想起了当时的六站政治处干事吴川生，2016年10月，我在重庆再次见到了他。吴干事后来成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航天员系统的首长之一，参与了中国首批航天员选拔训练以及“神舟”五号飞冲九霄的全过程，是航天英雄杨利伟的直接领导。

2004年，吴川生出版了一本记录中国航天员执行首次载人飞行的专著，书名叫《出征日志》。到重庆的那天晚上，他特地送了一本给我，书里面有一段话意味深长，特别让人共情：“通过这种孤独、异常的考验，再加上其他形式的心理训练，培养航天员无所畏惧、坚定沉着心理素质。”

读到“孤独”这两个字，我忍不住唏嘘感叹。

们的行头也很简单：小吉普车，“解放130”电影放映机和两部共10多盒的电影胶片，我和驾驶员老李，以及随车的被盖、毛毡、两壶淡水、几片饼干。

万万没想到，经验丰富的驾驶员老李开着开着竟然找不到方向了，汽车就在戈壁滩上打转转。

“好像走错路了！”老李皱紧眉头，把车停下来，前后左右仔细观察。

“那就干脆歇一阵嘛，吃几块饼干，再走。”起初我可不是特别在意。

但老李显然开始紧张了，拿起手电筒东照西照，嘴里面还骂骂咧咧的。

10多分钟过去了，我开始意识到我们遇上了麻烦，心跳也有点加快。

“走，边走边观察。你注意右面，如果看到一块直杠杠的雅丹，底下有一蓬骆驼刺，就喊一声！”老李一边说，一边发动吉普车。

雅丹是罗布泊独有的一种风蚀性地貌。我们在罗布泊穿来穿去，在一些特殊地形路段，偶尔可以碰见雅丹或雅丹群。

搓板似的戈壁滩上，隐隐现出几道汽车轮胎的痕迹，但凑近一看，却是黄沙吹过的遗踪。天色完全黑了，如果再找不到正确的路，我们就真的危险了。

好在半个多小时后，老李凭着他的胆识和经验，终于驾驶吉普车走上了正确的路。又过了一个多小时，我们顺利到达了目标任务点。点号的战友已因为久等而焦急万分，听到越来越近的吉普车轰鸣，他们跳跃着，欢呼着，簇拥我和老李犹如英雄归来。

这件事，我和老李一直没对人说，毕竟在罗布泊当过兵的人，哪个没遇到点稀奇事？

于发现了他们，“简直是鬼门关走一遭！”听完李排长更恐怖的罗布泊遇险，我沉默了，好一阵都没有说话。

后来我又听说我们电影队1976年的老兵王景林班长有一次也在罗布泊迷路，也是险象环生。那天，发现偏离路线后的一个多小时，他和驾驶员战友王德明没有慌乱，更关键的是，他们以十万分之一的小概率巧遇一支科考队，这才绝处逢生。

我知道，每一次在罗布泊迷路，其实都离倒下只隔着一层纸的距离。现在讲出来，叫往事难忘，而在当年，处置不当或运气不好，那就是战友一去兮不复还！

1978年春节过后，六站副政委韩洪恩就在罗布泊经历过一场生死大考验。那天他们一行五人因为汽车发生故障被迫徒步大漠，跌跌撞撞60多公里，一路上惊险不断，从下午3点多钟一直走到凌晨两点过，终于赶在体力几乎耗尽的紧要关头，到达了目标任务点号。

孤独，大漠的孤独，难以言表的孤独，我们体验过、无奈过、抗击过。历经艰险之后，罗布泊的军人因而特别珍惜战友情谊。

2016年4月，六站部分老战友近200人齐聚重庆，战友们咋咋呼呼地熊抱，韩洪恩激动得泪流满面。随后的几年，老战友又陆续在西昌和太原相聚，当我看见太原的贾玉德、梁建筑、梁建生、单志涛和西昌的张雅凉、叶文富等老战友，好像又回到了黄沙弥漫的罗布泊。

曾经虽然苦，虽然险，但我一直觉得，罗布泊待我不薄。

没有什么比罗布泊更荒芜，也没有什么比罗布泊更高贵，就是这样。

（作者系重庆散文学会副会长 图片由作者提供）

未经授权，请勿转载。



图说（由上至下）：

战友们1979年在罗布泊的地窝子外读报学习

电影队战友1980年在营区地窝子测试放映机。右起：孙怀田、张科吉、费昌奎、施俊波，后排为王爱忠。

1979年和重庆战友合影，宣明（前排左二）、周胜利（后排右一）。

作者常克1979年在罗布泊营区附近

